

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

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就要解决如何理解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及其与实现高质量发展关系这个前提性问题。对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思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理解为否定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出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人类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坚持系统论、整体论和协同论的辩证思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转化为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3)01-0026-11

收稿日期:2022-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09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2022JZDZ019)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男,湖北黄陂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quires that we “plan our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must address the prerequisite issue of how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connotation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fferent theoretical spectrums of ecological thinking differ in their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the ecocent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understands this connotation as a state of existence that denies the use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where humans are subservient to nature; modern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on green development starts from the goal of sustai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y and capital’s pursuit of profit, and understands the connotation 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humans to protect the natural conditions of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 first,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harmon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man, and man and himself,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mphasizing that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system theory, holism and synergy,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ransformed into a green development method and lifestyle, the goal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strategy of reinvigor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alents and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决定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过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发展,而是协调、可持续、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如何准确地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如何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

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内涵的科学理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理想,也是所有生态文明思想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从1949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发表的《沙乡年鉴》以来,作为理论形态的当代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他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价值立场和对“发展”的不同理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基础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作出了科学的理解和阐释,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从理论基础的维度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根据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

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一方面强调应当树立整体论和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另一方面反对人类中心价值观,主张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并把整体论和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作为其理论基础,强调人类之外的存在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进而要求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从价值立场的维度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力图通过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存在之外的存在物上,要求人类平等地对待生态系统的存在物,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既与他们所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生产与生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一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与他们所秉承的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内在缺陷密切相关。前者使得他们名义上是为了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实际上是为了维系资本利益集团和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后者则使他们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忽视和否定正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造成了当代生态危机这一现实,而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其理论的价值立场是维系资本和中产阶级既得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从他们如何看待发展的维度看,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运用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

增长的同时,把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完全忽视了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希望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和要求,并借口保证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和谐,反对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解释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其结果是只能导致否定人的生存权利的激进环境运动,不懂得当人们无法维系自身生存的时候,人们只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维系生存,这就意味着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所追求的维系地区生态系统稳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的理想无法真正实现,最终只会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而沦为一种抽象伦理话语。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是在回应生态中心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股生态思潮。他们不仅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而且强调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不容否定。但他们又强调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应当得到满足,忽视人类保护生态系统稳定的责任与义务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一步修正为基于人类的理性偏好、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强调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前提,由此形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但是问题在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一方面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另一方面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

系的内涵理解为人们应当承担的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虽然肯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资本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既造成本国的生态危机,又掠夺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恶化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横加指责,完全忽视和否定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生存权与发展权,并最终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这也必然使得他们所谓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愿望无法真正实现,最终沦为空谈。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立场,在强调人类与自然的有机关系的同时,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基础和前提,强调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以人和自然关系危机的中介所表现出的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上的危机。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的中断与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提出应当通过“两个和解”,即既要消除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又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是以科

学技术与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基础,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和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态型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价值观批判的有机统一,在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命题的同时,揭示了资本的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和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不仅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且也必然造成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只有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和价值观的变革,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展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由此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理解为遵循生态理性和生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基本需要为基础,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生态思想的超越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作出了独特的阐释。

第一,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3个原创性的概念,分别从生态本体论的维度论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共生关系;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论述人类应当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从人类实践活动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关系的维

度,强调树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安全底线、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共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格局的重要性。

第二,提出了以环境正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和”的文化价值观,既强调应当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协调好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环境正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和谐社会,又强调应当建立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摆脱工业文明流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对人身心的支配与损害,实现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共同发展。

第三,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割裂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辩证关系的缺陷,提出了以问题导向和系统论、整体论的辩证方法为基础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提出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和各级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模式,实现了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保证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规划与生态治理的效率。在如何展开生态治理的问题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强调的是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变革的“生态德治”,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绿色发展思潮则强调的是建立严格的环境制度硬性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治”,二者割裂了“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的辩证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1],另一方面又强调树立以“和”为主题的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对于提升人们

保护生态环境内在自觉的作用,认为“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是不可分离和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塞罕坝林场建设的艰苦奋斗史的同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应当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发挥“塞罕坝精神”的示范作用,明确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始终强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遵循抓重点、补短板 and 强弱项的“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的方法论,把人民群众意见大、怨言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优先和重点解决的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把人民群众关切的环境问题与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

第四,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借口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归结为否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也不同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立足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基于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肯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内涵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又强调应当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和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情怀”,一方面提出了应当树立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把这一生态文明理念外化为绿色发展方式,强调离开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生态文明建设就无异于缘木求鱼,生态文明建设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在发展中坚持生态优先、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修复优先的方针,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就能使自然资源既发挥生态效益,又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保持发展的后劲与可持续性,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实现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了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按照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发展现实,在厘清不同民族国家对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不同责任的基础上,承担起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同责任,把民族国家通过经济社会绿色转型追求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与促进整个世界绿色生态转型与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通过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一个美丽清洁世界的主张。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

从党的执政目的和保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的出发,党的十八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通过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

进入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面临的生态制约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3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应遵循的“十个坚持”的基本原则,通过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使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根本性的转折与巨大成就,强调要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哲学基础的新发展理念,建构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二十大肯定了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更明确提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

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把中国式现代化归结为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5点特质,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实现高质量发展看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认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这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看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

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批判性超越的结果。从中国国情的维度看,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也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成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但是长期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在生态资源的制约下难以持续和难以为继,其注重发展速度、数量与相对忽视发展质量的特点也使这种发展方式所生产的产品沦为无效供给。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目的和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的出发,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切实解决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的问题,实现以发展的速度、数量和质量有机统一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从对人类文明发展反思的维度看,人类文明发展总的来看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历程,并具体展现为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想追求。伴随着人类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关系的反思,人

类文明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生态转向,这一生态转向的核心是强调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进而涌现了多种理论谱系的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指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与人类文明兴衰更替的影响,指出人类四大古代文明均起源于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但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了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和中国楼兰文明的衰落。习近平总书记由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强调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必须依赖自然,指出人类善待自然,自然就会馈赠人类,反之,自然就会惩罚人类。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从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批判性超越的维度看,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西方现代化带来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批评了西方现代化是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等暴力方式实现的,给本国人民和落后国家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是一种损人利己和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道路,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是放任资本逐利的现代化,不仅强调这种“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3],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发展不是“真发展”,强调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化是边污染、边治理的现代化,并由此形

成了影响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创伤。西方现代化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的教训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再走美欧现代化的老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1]。这里所讲的“科学发展之路”实际上就是不同于美欧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这种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追求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又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正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并把这种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也决定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1]。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并对如何实现完成上述任务的具体途径作出了战略部署。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强调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具备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那种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的发展,而是协调、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应当破除那种认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认识到二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正在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强调那种“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不仅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而且会反过来影响长远发展”^[1]。另一方面应当认识到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和无效的投入,而是关系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强调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把这种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践行生态生产力观,又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的战略,建立健全的自然资源配置体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发挥出生态优势和保证发展的后劲,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正确地理解发展的本质以及正确处理如何发展的问题,加快建立和健全自然资源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划分,构建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在发展的本质问题上,首先要破除把发展理解为不顾生态环境代价,仅仅追求发展速度和数量的单纯经济发展观,而应当把发展理解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内在统一的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就决定了能否树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哲学基础的,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是关系到能否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那样脱离技术运用、经济发展去探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又反对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绿色发展理论那样——把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本

追求利润,始终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与生态文明建设不能脱离技术运用和经济发展,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但又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实现这种统一的前提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念和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践行生态生产力观,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内在统一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包括发展观念、发展方式、发展目的等内容在内的创新性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由此要求把教育、科技、人才看作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培育一批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同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通过实施科教强国战略、人才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否具有创新性人才和能否实现科技创新,不仅决定了我们能否真正转换粗放型发展方式,实现内涵式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决定了我们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能否持续处于优势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3]。虽然中国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巨大的成就,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存在着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这就要求中国的科学技

术研究既要完善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科学评价体制、科学管理体制的变革,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创新主体,又要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抓住世界新一轮新技术革命,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

第四,必须采取系统论、整体论、协同论、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统一的辩证思维,在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和系统保护,保证和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同时,立足于人民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精准、科学与依法治污,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证生态安全、协同推进“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主体功能划分和定位,以国家重点功能区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和国家公园建设为依托,加快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的建设,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四、结语

之所以必须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看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是由生态规律的客观性、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生态制约以及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只不过我们不应当像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那样,或者否定发展,忽视和否定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或者把发展的目的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把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生态平衡看作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的内涵。而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的内涵理解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基础,实现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并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转化为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践行生态生产力观和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遵循系统论、整体论和协同论辩证统一的辩证思维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佳)